

增强文艺作品的中华文化辨识度

张晶



有时候觉得，写小说就是往墙上钉钉子，然后再往钉子上挂包袱。钉子当然只是个比方，约摸就是通常所说的主题。主题其实是恒定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前赴后继，在写这些千古而依旧的事情。我们所看到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是挂在这些钉子上的包袱。

大部分时间，读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包袱上，这是必然的。决定一部作品是否成立，是大是小、是钢铁是棉花，不在钉子，再老的主题都能有当下的个性化的解读。说过的话，可以再说一遍、再听一遍，不同的语言振动着不同年份的空气，以及空气中的灰尘，这话，已然不同了。问题是，如何“已然不同”了？

这就要打另一个比方了。我曾经去看一个摄影展，同样的背景与题材，更吸引我们的总是些日常与细节，是街道上走路的人、正在准备晚餐的母亲，是窗户与帘子后的目光。有人感叹摄影器材好，也有人认为要亲临现场、要躬逢盛世、要贴近对象。更关键的是，如何取景、如何构图，该留下什么，又该不要什么。

说到“取景”。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日月，决定写作者的高下，不在于装备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文学之魅的奥秘同样在于“取景”。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它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虚构或非虚构，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编织出的那只包袱将以什么样的结构、比例、内容、质地，悬挂到那些完全公开的、几乎是透明的钉子上。

这大致就是通常所说的怎么写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流行写作与畅销书同样在写成长、爱情、人性、冒险等，可作者所挂上去的是过分漂亮、讨人喜欢的包袱，像怒放的花朵，开过一个热闹的季节，或也就随风而去了。另一些作家，在同样的钉子上挂上去的包袱绝不魅人，不那么戏剧性，甚至都没有那么巨大，可是怪了，它们就是可以长久地占据在那面墙上，像生了根，安了家。

一部分作家可能会在这里犹豫不决，或者干脆另起炉灶，他觉得应当聪明一些，同一个钉子上，已经有了太好的包袱，应当回避可能的风险与徒劳。但另一些作家不在意，偏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钉子上去作为。他在影响的焦虑中诞生出一种信心，相信他的包袱里会包藏着对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种理解，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世界。

当然，钉子、取景器、包袱，本都是不必多虑的事。真正高明的作家可能都不会让你看到钉子，甚至也看不到包袱。你所见到的好像就是两三个人物、四五段回忆，还有若干的晨昏，随意而辽阔地搭配在那里，这是没有了边界线与挖磨磨的包袱，是已经融入了白墙、融入了视线、融入了世界本身的存在。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写出最后一种小说，这种处理掉钉子、也淡化掉包袱的小说。我知道我曾经为寻找与众不同的钉子而耿耿于怀，也曾经在意包袱的大小与轻重而拼命往里塞东西。又有一阵子，试图窥视和隐藏最初的那枚让我注目的钉子……我怀疑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一直处于惶然取舍与自我斗争的阶段。当然，这都是需要的过程，而过程，总是大大美妙于终点的。

写作的美妙在于「取景」

鲁敏

化辨识度。这里尽管略有比喻的成分，但也说明了各种艺术门类都应该具有中华文化辨识度。

从当下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或审美趣味而言，中华文化辨识度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内涵，也是面对文艺作品的主要审美诉求。从文艺的角度来讲，“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是要以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表现人民的思想情感、人民为美好生活奋斗的历史进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奋斗历程，把人民作为主角；从文艺的审美接受和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讲，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真正地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真正了解人民当下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这就告诉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能将人民仅仅当作被动的欣赏者，而是应该把人民作为具有时代审美趣味和审美理解力、判断力的审美批评主体。生长在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人民，对于国内创作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蹈等艺术门类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辨识意识和辨识能力。这种辨识主要在于其中中华文化的根源与色彩。

中华文化辨识度，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有内外两个层面。从内在角度讲，作品包含着中华文化传统基因，如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伦理价值等在作品中的生发与体现；从外在角度讲，作品的艺术形式、艺术媒介以及艺术结构的方式等，都是中华文化辨识度的内涵。如在中国诗词中，诗词格律包括近体诗、古体诗、乐府诗等，都有很高的汉语声律的辨识度。在绘画领域，如中国的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等，都有独特的技法、笔墨、结构，也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辨识度。从内涵上看，如陶渊明诗所表现出的平淡自然的风格、王维诗的澄明而带禅意的意境、杜甫诗那种充满仁爱之心的情怀，都有很强的中华文化辨识度。中国画中的山水人物画，也都一望可知地呈现出中华

文化的神韵。清人叶燮对诗人胸襟高度重视，如他的论诗名著《原诗》中所说：“我谓作诗者，亦必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遇发生，随生而盛。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遣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如星宿之海，万源从出；如钻燧之火，无处不发；如肥沃壤，时雨一过，天矫万物，随类而兴，生意各别，而无不具足。”在诗学中，这种对作家主体胸襟的认识，恰也是对中华文化的辨识。当代的文艺作品，大多数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辨识度。芭蕾舞剧是从西方传入的艺术形式，但是我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等都有着鲜明的中华文化辨识度，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的经典之作。交响乐亦然。很显然，交响乐也是西方音乐的经典形式，但中国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却以极为优美的民族特色，成为蜚声世界的交响乐经典。2022年国庆期间由中国爱乐乐团等五家国内主要的交响乐团举办并演出的系列户外大型交响乐《江山如画》，也是以非常鲜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形式，呈现着明显的中国风，成为中国交响乐史上的一部佳作！央视春晚上的舞蹈《只此青绿》，其浓厚的中华文化辨识度，达到了“高光时刻”。在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中，许多文艺作品都呈现了这种体现鲜活的民族气派、民族特色的文化辨识度。

在文艺作品中强化中华文化辨识度，也是我们的审美风尚建设所需要的。中华文化辨识度的强化与深入，对于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为了新的百年征程，为了中国人民的审美需求，多出精品力作！

穿透历史阐释精神追求

——《沐月记》的艺术特色

马明高



《沐月记》书影

《沐月记》(中国文史出版社)是李迎兵继《狼密谷》《狼狐郡》之后，历经数年精心创作的又一部以山西吕梁离石为历史文化地理坐标的鸿篇巨制，是一部满怀真情书写历史境遇中人的命运史与心灵史的撼动人心的长篇力作。

《沐月记》取自成语“沐日浴月”，是想“坚定明朗”地叙写“女主人公小月莺(即李潇丽)化蛹成蝶的蜕变过程，从燕京大学一路西行，就是那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在这样的人物流运主轴中，小说里又有那个那个年代小人物的命运沉浮让人读来唏嘘不已。贴着人物去写，也就会看到更多历史与现实以下的人间景象”(邱华栋：《沐月记·序言》)。肯定，李迎兵在自己的心中，有一种渴望与追求，这就是“钩沉历史，观照现实，蹒跚千里，史诗品质”(《沐月记》封面语)。他想通过“文学的直觉透视力，体现在‘以心击之’，然后‘穿透其境’，从而体现长篇小说的温润、丰盈、深刻、绵长”(张平推荐语)。

《沐月记》是以从吕梁离石东关街“李府”走出来的爱国人士、伟大战士李效黎的事迹为依托创作的。李效黎，原名李月英，1931年考入太原女子师范，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她与丈夫林迈可帮助八路军转运药品等物资，到延安为八路军培训大量无线电专业人才，组装无线电发报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李效黎著有回忆录《延安情》。

但是，李迎兵的长篇小说《沐月记》不是对历史的再一次仿写，更不是《延安情》的翻版。他着力叙写李潇丽青少年时代和有关李府同时期的诸多人物命运与传奇故事。这部小说从古老的山西离石大人物家李府开始，写小月莺幼小心灵中的李府，写李府里出出进进的各色人等。通过主人公小月莺的成长、经历，写出了她的所闻所闻、所思所想，描写了20世纪初期战争离乱中诸多小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个人的选择与追求。小说视角宏阔，事件丰富，人物众多，不是固守于叙事时间的线性关系，而是着眼于人物心灵的需要，对叙事时间忽前忽后挪腾转移，灵活叙写。在整体上遵循故事本来的时间顺序，但也不乏诸多细节上的预叙、倒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

小说围绕李潇丽的成长经历，以及到太原读书、学生罢课、北上上大学、奔赴延安等故事情节，成功塑造了一大批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李府内外的十几位主要人物，更是贯穿全书，命运不同，令人难忘。李迎兵没有去简单地图解历史，而是围绕人物的传奇故事与情感经历，去叙写他们不同的人生命运轨迹，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他们的心灵吟唱。他着力于在历史岁月与时光缝隙里发现未被世人窥见的生命叹息，并且沿着这些碎片式生命瞬间进入人的精神洞穴，书写各个人物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心态，让小说文本呈现出更多的日月星辰之光照不到的人之心灵领域的微妙存在。

李迎兵的“离石三部曲”，都是把人物放在他们生存与生活的历史时空里，设身处地地融入到那些特定的历史境遇里，去叙写他们的不同人生命运。将“人”放进“历史”之中，把“人”置于“历史”特定的环境与氛围中，“人”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形态与精神心态，就与风景、风俗、风情有了更为密切的关联，就一下子具有了生命存在与体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李迎兵不是去“颠覆”而是努力去重建历史，重建历史感和真实感，并且在重建的过程中，去探究和追问历史的真相与历史处境中的人。他注重以细节重构历史，注重个体记忆与历史关系的呈现。《沐月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采用现有的女主人公原型的回忆录《延安情》的集体记忆与公共意识，而是选择以个人记忆为主体，以李潇丽小时候眼中的李府印象为主体，去着力还原当时那些出出进进李府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生存本相与人生命运。特别是那些女性人物，诸如那硕梅、曾玉芬、何彩花等的不同命运，都是对小月莺(即李潇丽)后来人生走向与命运抉择的警醒；再不能重走她们的的人生之路了，必须去追求独立而自由的人生理想，为更多的人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工作和奋斗。小说之所以着力于女主人公李潇丽走出吕梁，奔赴太原、北平、延安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感、所思所想，都是因为个人记忆不同于集体记忆，它以饱满的细节、生动的感情、传奇的故事，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具有了强烈的空间感和流动感。正是这种小说叙事的主基调，给予了过去岁月与时光新的历史阐释模式。

《沐月记》中所写的李府与李府中众多的人生命运故事，大都不是真实的李家所存在的。李潇丽在省城太原、京城北平、八路军根据地及革命圣地延安的情节与人物，也大都不是主人公原型回忆录中不存在的。原有的事实与作家的想象已经重新编码，细小的个人史已经与宏大的地方史、民族史，进行了有机的艺术重构。可以看出，作家在兼具个人化、宏大性、现实性和传奇性历史叙事的追求中，更关注李府李府、省城太原、京城北平等地人们的日常生活、生存体验和个人情感，着力去写各色人等的人生命运，去写这些人物的命运体验。

「深处」才是文学的独有部分

李浩

“在中国深处，在文学深处”——我特别喜欢“深处”这个词，它意味我们不仅是奇观化地观察和呈现那个在新闻纸中被事件累加的中国和文学，而是深入，更深入，试图摸到或抓住那条更内在、更能支配现实扭动和人物选择的东西，无论是针对中国现实还是针对文学本身。它其实也是在提示我们，时间进行到当下和此刻，我们应当向更深处开掘，不断深化，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现实表象的摹仿。“深处”才是文学应当展示的并且不为其他学科(像摄影、影视)所替代的独有部分。

现象从来是多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的“社会事件”同样是多的，或者更多的，但它不应是我们文学追逐的方向，我们要承认奇观化的、描摹现实图景和表象事件的小说往往不具备永恒性质，它有时甚至太容易过时，而致力于察看“深处”、凝视与反思这个“深处”的小说，更具永恒性和深入性，更能成为“反映时代”(我指的是反映时代最前沿的思考和追问，反映时代的这一高度、认知深度)的可贵标尺。认为“反映”在我看来更为有效，它对后来的阅读者意义也更大。我们阅读唐诗宋词，阅读莎士比亚和但丁，第一期许绝不是我们试图从中“看到”唐朝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使用的器具和种植的植物、穿布鞋还是穿草鞋，它们不会是第一要务。我们首先要的是它所折射的人类共有议题，是引发我们审美知觉和思考力量的部分，是我们在精神上的有效共鸣——对于小说，对于当下的小说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

一切文学、一切艺术，尤其是经典的文学艺术，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源自于生活，是生活和当下经验的给予，但落实到文学和艺术上，它需要也肯定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它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的情感包围着，对消防员的英勇无畏精神肃然起敬，无数次为他们和家属的无悔付出流下热泪。消防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亚于真正的战争。他们这些火场的“逆行者”，是这个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有特点，最好能对影响过我的文学形成“反哺”。在这里，我利用丰富阔大的“中国元素”，利用民间传说和神话，利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传奇，利用积累下来的历史知识，但试图展现的依然是我对“中国深处、文学深处”的理解和勘探，希望在它的里面放置下我的“理想、思想和梦”。

书写和平年代的英雄

房伟

创作短篇小说《果奠》的缘起，与2019年夏天我在安徽、山东一带的采访工作有关。因为一个写作计划，我利用暑假时间，跑了很多消防队，先后采访消防应急救援的相关领导、各级消防员、消防员的亲人朋友等50余人。他们的故事极大震撼了我。那些天，我时刻被一种温暖的情感包围着，对消防员的英勇无畏精神肃然起敬，无数次为他们和家属的无悔付出流下热泪。消防员的工作强度非常大，精神高度紧张，他们所面临的严峻考验，不亚于真正的战争。他们这些火场的“逆行者”，是这个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

我从小就有“英雄情结”，在我的心中，崇敬英雄、礼

赞英雄，那是应有之义。

2016年以来，我创作了20多个中短篇抗战题材小说，除了战争中普通人的际遇，我也想考察普通人如何变成英雄。这次采访任务，对我来说，是一次扩大视野、拓展人生的机会。我想，一定要用小说形式写写他们的故事。

但是，我并不想把“英雄”写成“超人”，也不想将英雄们的故事，写成简单的事迹汇报。“真实”是艺术的第一生命力。要写出英雄的成长、英雄的困境、英雄的无奈和悲伤，也要写他们内心的真和善如何推动他们，在关键时刻承受凡人所不能承受的生命考验，成就人生的辉煌。写英雄的难度大于写普通人，要拒绝脸谱化和口

号化。当下的商品消费时代，这些英雄们是如何在消防这个大熔炉中锻炼自己，将自己打造成祖国和人民的守护者的？他们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怎样平衡七情六欲？近些年，有不少反映消防员生活的电影和网络小说，但很多并没有触及深层次问题。勇于牺牲、为他人奋斗，这些“善”，让消防员们用生命去守护别人。同时，越是描写英雄的小说，越要注意小说的叙述形式和讲故事构思，既不能过于花哨、喧宾夺主，又不能简单直露、直白浅显。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它更需要精心构思。小说中，英雄消防员孟凯的母亲，在孩子牺牲之后，执意在中秋为消防部队送果肉罐头。这样的行为，持续了很多年。这些饱含情意的罐头，既寄托了一位母亲的哀思，也写出了她的崇高精神。这一场年年都会举行的“果奠”，也就成了美好情感的象征。

正是消防员、医生、护士、解放军战士等和平年代英雄们的守护，我们才能平安幸福度过一个个白天和黑夜。让我们一起记录这些英雄，讲好真正的“中国故事”。

图片来源：百度

